

## 【中国传统学术】

## “中道”观念与中国史学传统

杨朝明 王纪东

**提 要:**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具有独特的风格,不仅务求真实记录,而且运用褒扬和贬抑等书法义例评判历史,其依据则是“中道”观念。“中道”观念是上古圣王为政理民的智慧结晶,其传承与发展与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品格关联密切,影响后世很大。

**关键词:**史学传统;中道;政治文化

近百年间,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怀疑和批判曾经成为学界的思潮,有学者甚至将中国正史说成“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”,<sup>1</sup>史家治史被说成专为君权专制服务的工具。上世纪80年代曾有“历史危机”论,人们追问“研究历史有什么用”。显然,所谓“用”,“不能变为功利主义的用”,<sup>2</sup>功利化了的“用”是被降低了标准的“用”。中国传统史学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惩戒政治,这便是通常所谓“史载笔,士载言”。<sup>3</sup>中国史事“史不绝书”,<sup>4</sup>早已形成了“君举必书”、<sup>5</sup>“书法不隐”、<sup>6</sup>“天子无戏言,言则史书之”、<sup>7</sup>“烈士殉名,壮夫重气”<sup>8</sup>等富有礼学精神的史学传统。本文试图申说的是,这种史家治史不局限于记事,而且通过褒扬和贬抑等书法对其进行评判,功过必书于史册,务求使“元凶巨慝有所畏,正人君子有所宗”,<sup>9</sup>深深体现了中国上古的“中道”观念。

## 一、史官制度与上古政治文化

世传创造文字的仓颉和沮诵是中国最早的史官,<sup>10</sup>但不论如何,中国的史官出现很早,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制度。<sup>11</sup>史官的职责主要是记事,其后再根据所记,整理为史籍。近人指出:“史之初义为史官而非史书……在中

国,史书是后起之义,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写之史书”。<sup>12</sup>史书出自史官记事,蕴含了史官的治世理念或政治思想。

<sup>1</sup> 梁启超:《新史学·中国之旧史》,载氏著:《饮冰室合集》第1册,《饮冰室文集之九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年,第3页。

<sup>2</sup> 李学勤: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8年,第82页。

<sup>3</sup> 郑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礼记正义》卷3,《曲礼上第一·曲礼上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250页。

<sup>4</sup> 杜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40,襄公二十九年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006页。

<sup>5</sup> 杜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10,庄公二十三年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779页。

<sup>6</sup> 杜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21,宣公二年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867页。

<sup>7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39,《晋世家第九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635页。

<sup>8</sup> 刘知几撰,张振佩笺注:《史通笺注》,贵州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255页。

<sup>9</sup> 柳诒徵:《国史要义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10页。

<sup>10</sup> 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载:“史之建官,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,仓颉、沮诵,实居其职。”详参刘知几撰,张振佩笺注:《史通笺注》,第392页。

<sup>11</sup> 杜维运先生认为中国最迟在商代,或者在夏代,就已经设立史官了。详参杜维运:《中国史学史》(第1册)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0年,第40页。

<sup>12</sup> 李宗侗:《中国史学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0年,第1页。

不难理解,史官与史官制度的出现,标志着人类历史意识的高度发展,在某种程度上,显示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理路有了很高水平的认知。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认为的那样,研究中国历史和史学之起源,有益于深入认识中华民族富于政治性色彩的内在原因。我们观察史官制度与上古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甚为重要。<sup>1</sup>

### (一) 史:以手持“中”

中国汉字具有表义功能。“历史”的“史”,其文字构型本身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早期“史”与“中”的关系。

史学研究源自史籍,史籍撰自史家,中国最早的史家出自史官。从“史”字本义看,《说文》记载说:“史,记事者也,从又持中。中,正也。”江永释其义为:“凡官署簿书谓之史,故诸官言治中受中,小司寇断庶民讼狱治中,皆谓簿书,犹今之案卷也。此中字之本义,故张文书者谓之史。其字从又,从中,又者右手,以手持簿书也。”<sup>2</sup>对于这里“中”字之义,目前学界存有多种注释。我们以为可以理解为“中道”是最为恰当的。孔子说:“政者,正也。”<sup>3</sup>政治之根本就是“正”,所谓“正”,就是符合“礼”。孔子说:“礼也者,理也”,<sup>4</sup>“合理”的才是“合礼”的。这便是《孔子家语·论礼》中记载的孔子之言:“夫礼,所以制中也。”<sup>5</sup>

史官治史关键是“持中”,就是说,史官记事同时肩负着评判其事是否符合礼的职责。《周礼·地官司徒》说:师氏“掌国中、失之事,以教国子弟。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”。郑玄注:“教之者,使识旧事也。中,中礼也;失,失礼者也。”<sup>6</sup>《逸周书·武顺解》说:“人道尚中,耳目役心”,又说:“人道曰礼”。<sup>7</sup>“尚中”与崇礼的观念是一致的。这样看来,在中国早期政治理念中,“礼”和“中”关联非常密切,甚至可以说衡量“中道”的标准就是“礼”,或可说“礼”是为政理民的范式准则,而“中道”则是实现、保持“礼”的理念和方法。

近代曾有学者考《周官》五史之职掌,认为“归纳于一则曰礼”,又说:“礼者,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。”<sup>8</sup>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。史官治史要把持“中道”,其实就是要遵循天道,合乎情理,顺应人心。

### (二) “史”的职责在“赞治”

商周时期是史官出现的早期,史官把握“中道”及其与“礼”的关系,或者那个历史时期史官的职能,使之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。

《周礼》释“史”说:“史,掌官书以赞治。”郑玄注:“赞治,若今起文书草文书也。”<sup>9</sup>赞治,就是“佐治”,即帮助国家治理,不会仅仅像今日之“文书”而已。郑玄所说恐怕有简单化的嫌疑。《大戴礼记》载:“天子御者,内史、太史,左右手也。”<sup>10</sup>中国自上古时期,天子与诸侯行事,就设立史官在侧随时记录,“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”,<sup>11</sup>天子视内史、太史为执政的“左右手”,如此看重史官,绝不仅限于他们的记事备忘,更重要的是依靠他们的监督、指正效用。

“清华简”《保训》篇的问世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。《保训》篇记载周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,用这两件史事,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即“中”,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。“中”的观念是《保训》全篇的中心。前者是关于舜的,文王说:“昔舜旧作小人,亲耕于历丘,恐求中,自稽厥志,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。”<sup>12</sup>强调舜出身民间,能够自我省察,不违反百姓的种种愿求。他在朝廷内外施

<sup>1</sup> 柳诒徵:《国史要义》,第2页。

<sup>2</sup> 江永:《周礼疑义举要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58页。

<sup>3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12,《颜渊第十二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504页。

<sup>4</sup> 杨朝明、宋立林主编:《孔子家语通解》卷6,《论礼第二十七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09年,第319页。

<sup>5</sup> 杨朝明、宋立林主编:《孔子家语通解》卷6,《论礼第二十七》,第318页。

<sup>6</sup> 郑玄注,贾公彦疏:《周礼注疏》卷14,《地官司徒第二·师氏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731页。

<sup>7</sup> 黄怀信、张懋荣、田旭东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卷3,《武顺解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326页—327页。

<sup>8</sup> 柳诒徵:《国史要义》,第5—10页。

<sup>9</sup> 郑玄注,贾公彦疏:《周礼注疏》卷2,《天官冢宰第一·宰夫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655页。

<sup>10</sup> 孔广森:《大戴礼记补注》卷6,《盛德第六十六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3年,第156页。

<sup>11</sup> 郑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礼记正义》卷29,《玉藻第十三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473—1474页。

<sup>12</sup> 李学勤:《清华简〈保训〉篇释读补正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,2009年第3期。

政,总是设身处地,从正反两面考虑,将事情做好,从而达到中正之道。第二件是关于微的。微就是上甲,是商汤的六世祖。文王说:“昔微假中于河,以复有易,有易服厥罪,微无害。乃归中于河。”<sup>1</sup>这里讲的是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故事。周文王说微“假中于河”,即凭靠河伯能秉持中道,公正行事,最终使有易服罪。按照《保训》记载,微由此把“中”传贻子孙,至于成汤,于是汤得天下。和上面讲的舜一样,“中”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。

由《保训》的启发,我们又想到《逸周书》。《逸周书·五权解》记载,武王临终时,同样希望儿子尽力做到“中”。于是,他对辅佐成王的周公说:“先后小子,勤在维政之失。”要他勤勤恳恳,力求避免政治上出现偏失。武王还强调,希望儿子“克中无苗”。“苗”通“谬”,即谬误、偏失。意思是尽力做到适中无邪,以“保”成王在位。武王接着说:“维中是以,以长小子于位,实维永宁。”<sup>2</sup>既要“保”其在位,又要“长”其于位,使他在王位上尽快成长起来。那么,怎么成长?就是要“维中是以”,“以”的意思是“用”,即维中是用。

无论周文王还是周武王,他们临终前训诫太子的嘱托中,所强调的竟然都是一个“中”字。文王、武王以后,周人认真遵行了“中”的思想。西周时期,“中道”思想很受重视。西周职官中有“师氏”,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或礼制,以之教育后代。原来,西周时期是以“中”来教育国中子弟。

这样看来,“中道”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被周天子视为治世之圭臬。史官担负着“左右手”的重任,天子、诸侯必定选择深谙礼法,善于掌握“中道”的德才兼优之人担任应该是合乎情理的。

上古时期,史官的职权范围很广,他们所职掌的史书,也是广义的,包括一切典章制度。史官职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的史书,所治史书又不是泛泛的记事,而是评判政治得失的政典。中国上古时期就具有“天聪明,自我民聪明;天明畏,自我民明畏”<sup>3</sup>的传统,历代“圣王”从民俗而知天命,原天理而制定礼仪,后世儒家推尚的“王道政治”,绝非一王一圣所能创垂,而是听取

总结民意,长期累积经验凝集沉淀而成。班彪称:“唐虞三代,诗书所及,世有史官,以司典籍。”<sup>4</sup>上古十分重视以史劝诫政治,形成了“未尝离事而言理”<sup>5</sup>的传统,推动着“王道”政治文化的塑成和传承。

## 二、史官谏王之制与“中道”

商周时期的史官“赞治”,是通过上古的政治制度实现的。中国史官一贯就有秉笔直书之传统,治史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,<sup>6</sup>有时,为坚守“中道”,甚至冒着生命危险,彰显出史家的高贵气节。但这不是仅仅出于史官的“史德”,而是有辅政谏王制度的保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史官记事便有了共同必守之法,也就是说,这是由他们的权力与职责所决定的。

### (一) 史官辅政谏王之制

早在三代时期,中国就形成了史官据法典谏王的制度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篇》称:“三代之礼,天子春朝朝日,秋暮夕月……食以礼,彻以乐,失度则史书之,工诵之,三公进而读之,宰夫减其膳。”<sup>7</sup>又,《国语·周语》记载:“天子听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,瞽献典,史献书,师箴,瞽赋,矇诵,百工谏,庶人传语,近臣尽规,亲戚补察,瞽史教诲,耆艾修之,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”<sup>8</sup>。《礼记·王制》篇也记载着天子受谏、百官受质之文,都是由太史典礼执简以记录的文辞。

在那时,史官有其为官之“义”。典籍记载

<sup>1</sup> 李学勤:《清华简〈保训篇〉释读补正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,2009年第3期。

<sup>2</sup> 黄怀信、张懋荣、田旭东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卷5,《五权解》,第521、530页。

<sup>3</sup> 孙星衍: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2,《皋陶谟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87页。

<sup>4</sup> 范晔:《后汉书》卷40,《班彪列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325页。

<sup>5</sup> 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卷1,《易教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页。

<sup>6</sup> 司马光撰,胡三省注:《资治通鉴》卷197,《唐纪十三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57年,第6203页。

<sup>7</sup> 孔广森:《大戴礼记补注》卷3,《保傅第四十八》,第66页。

<sup>8</sup> 韦昭注:《国语》卷1,《周语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9页。

说：“史之义不得不书过，不书过则死”；<sup>1</sup>“史不记过，其罪杀之”；<sup>2</sup>以及“君举必书”。<sup>3</sup>在那个时期，共同的史官纪事原则，是“德刑礼义，无国不记”，<sup>4</sup>乃至以典礼史书限制君权，监督“天子不得为非”。<sup>5</sup>这是史官的天职，甚至有“一日失职，则死及之”<sup>6</sup>的说法。君待史官如师友，尊为“社稷之臣”，依靠他们辅助执政而补阙拾遗于左右。

天子一人尊于万民之上，如果像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所引《夏书》所说的那样“以从其淫”，必定为祸至烈。因此，古代圣哲深虑预防之策略，乃以典礼史书加以节制，“勿使过度”。<sup>7</sup>因此，“古之先王，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式也”。<sup>8</sup>即使贵为天子，如果处事失度，史官必定会据法给予惩戒。有学者指出，中国古代“史权之高于一切”<sup>9</sup>绝不是一句虚言。历史证明，除去桀、纣、幽、厉等昏主之外，但凡中材之主都能尊奉史权之约束。

上古时期，史官与天子实为亦师亦友之关系，“尚德而互助”，<sup>10</sup>天子任用史官记事，一方面以备遗忘，一方面考证得失，相勉于善，补阙拾遗。《尚书·皋陶谟》称：“臣哉邻哉！臣哉邻哉！”又称：“予违汝弼，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，钦四邻。”<sup>11</sup>古之圣王为政，上畏天命，下顺民心，唯恐失政害民，所以设立史官匡弼箴规，视之如“四邻”，或为师友。

周成王时，史佚与周公、召公、太公并为四圣，“乱为四辅”，其主要职责是“博闻强记，接给而善对”，周成王为政“虑无失计，而举无过事”，<sup>12</sup>四圣辅翼之功至为关键。史佚位居其一，史官辅政之重要性可见一斑。

## （二）史官之气节与政治秩序

史官辅政不仅监督君权，对于谋篡叛逆，不合法度的权势人物，一样坚守史德，“书法不隐”，<sup>13</sup>每冒生命危险。上古史家，艳称南、董。《左传》宣公二年载：“晋灵公不君……赵穿攻灵公于桃园，宣子（赵盾）未出山而复。太史书曰：赵盾弑其君。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‘不然。’对曰：‘子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？’宣子曰：‘乌乎！诗曰：‘我之怀矣。自诒伊戚，其我之谓矣。’”<sup>14</sup>文中所言的太史就是董狐，孔子称誉他为“古之良史”，直书赵宣子的过失，

使其背上弑君的罪名。

又，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，太史书曰：“‘崔杼弑其君。’崔子杀之，其弟嗣书，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闻既书矣，乃还。”<sup>15</sup>上古史官书事，公开不惧强权，后世史家赞曰：“盖烈士殉名，壮夫重气；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瓦砾长存”；<sup>16</sup>“南董之仗气直书，不避强御，韦崔之肆情奋笔，无所阿容。”<sup>17</sup>这种评价并不为过，上古史官“位尊地要”，<sup>18</sup>天子必须择取气节高尚兼博学多识的人士担任，并实行世袭的制度，在家学渊源和一脉相承的传统中，养成刚正不阿的品格是合乎情理的。

## 三、孔子“中道”与传统史学

在古代史书中，孔子“作”《春秋》，最明显地体现了上古时期的“中道”观念。据《论语·

<sup>1</sup> 孔广森：《大戴礼记补注》卷3，《保傅第四十八》，第65页。

<sup>2</sup> 毛公传，郑玄笺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毛诗正义》卷第2—3，《邶风·静女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310页。

<sup>3</sup> 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10，庄公二十三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779页。

<sup>4</sup> 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13，僖公七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799页。

<sup>5</sup> 孔广森：《大戴礼记补注》卷3，《保傅第四十八》，第67页。

<sup>6</sup> 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记：“物有其官，官修其方，朝夕思之。一日失职，则死及之。”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53，昭公二十九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2123页。

<sup>7</sup> 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32，襄公十四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958页。

<sup>8</sup> 班固：《汉书》卷30，《艺文志第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715页。

<sup>9</sup> 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》，第31页。

<sup>10</sup> 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》，第31页。

<sup>11</sup> 孙星衍：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2，《皋陶谟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96、106页。

<sup>12</sup> 孔广森：《大戴礼记补注》卷3，《保傅第四十八》，第68页。

<sup>13</sup> 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21，宣公二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867页。

<sup>14</sup> 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21，宣公二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867页。

<sup>15</sup> 杜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36，襄公二十五年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984页。

<sup>16</sup> 刘知几撰，张振佩笺注：《史通笺注》，第255页。

<sup>17</sup> 刘知几撰，张振佩笺注：《史通笺注》，第255页。

<sup>18</sup> 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269页。

八佾》，孔子曾说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<sup>1</sup>他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<sup>2</sup>将自尧、舜至文、武、周公以来的“中道”思想给以系统提升，形成了他的“中庸”思想。就像《孟子》所记述的，孔子不欲将自己的思想学说“载之空言”，于是整理鲁国历史，“作《春秋》”，寄寓自己的微言大义，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，从而“寓褒贬，别善恶”，将他的“中道”思想观念体现在他的政治著作之中。

孔子的“《春秋》笔法”乃是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传统，因为如《国语·鲁语上》所说的“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”。<sup>3</sup>孔子以前历史记载众多，这正如《墨子》中说到的“百国春秋”，这些历史记载都有自己的“书法义例”。不仅如此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孔子又有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看法或者独特认识，有自己对于当时的历史与政治的独到理解，因此他的“《春秋》笔法”，他在“作《春秋》”时所表现出来的“义例”，便体现了他的“中道”理解，这就是他“礼”的政治思想学说，就是他心目中的社会人生之“理”。

### （一）孔子与“中道”

如上所说，孔子的中庸思想渊源有自。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有所谓“十六字心传”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<sup>4</sup>孔子儒家的“中庸”思想就来源于此。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谈论“人情”与“人义”、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，无非是讲求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最佳结合点，这个点其实就是“中”，就是“礼”，就是“理”。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记载孔子说：“礼也者，理也；乐也者，节也。君子无理不动。无节不作。”<sup>5</sup>《礼记·礼器》说：“礼也者，合于天时，设于地财，顺于鬼神，合于人心，理万物者也。”<sup>6</sup>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

孔子称“中庸”为“至德”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“天地位”就是和谐，“万物育”就是发展。《中庸》又说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<sup>7</sup>从根本上说，孔子所说的“中道”既是社会稳定之道，又是社会发展之道。

在孔子看来，治理天下的“达道”就是“中庸”。不难理解，孔子作《春秋》乃具有用历史来

维持人类文明的深义。从孔子的“《春秋》大义”来看，他继承了上古史学“持中”的传统，并扩充、发展了“中庸之道”。在周代，自君师以至国子乡民，都崇尚“中和”。孔子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并以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”<sup>8</sup>来回应“哀公问政”，欣赏“郁郁乎文哉”<sup>9</sup>的周政，表示“从周”，孔子显然受周代“中道”观念影响很深。这一点，从他对“中庸”的推崇程度亦为明证。他极力推崇“中庸”，要求人们“依乎中庸”，“遵道而行”，为政治国要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”。<sup>10</sup>

关于“中庸”的解释很多，有的不免玄妙或庸俗化。其实，简言之，“中庸”就是“使用中道”。古时“庸”与“用”相通，这一点，从《易经》和不久前问世的地下文献（如郭店楚简《五行》篇）中都已经得到证明。郑玄注《中庸》说到：“名曰《中庸》者，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。庸，用也。”<sup>11</sup>又，庄子《齐物论》称：“庸也者，用也；”所谓“中庸”即是“用中”，就是在实际中使用“中道”，凡事要求合乎情理、恰到好处。有学者认为“中庸”是儒家在修身养性、齐家治国方面最核心的原则”，<sup>12</sup>极是！《礼记·中庸》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”<sup>13</sup>所谓“中”，也是人正常的情绪与心境，它的正常、适度、有节的表达，才会达到“和”。

<sup>1</sup> 何晏等注，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卷3，《八佾第三》，第2467页。

<sup>2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3，《中庸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34页。

<sup>3</sup> 韦昭注：《国语》卷4，《鲁语上》，第153页。

<sup>4</sup> 王先谦：《尚书孔传参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153页。

<sup>5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0，《仲尼燕居第二十八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34页。

<sup>6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23，《礼器第十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430—1431页。

<sup>7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2，《中庸第三十一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25页。

<sup>8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2，《中庸第三十一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29页。

<sup>9</sup> 何晏等注，邢昺疏：《论语注疏》卷3，《八佾第三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2467页。

<sup>10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2，《中庸第三十一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26页。

<sup>11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2，《中庸第三十一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25页。

<sup>12</sup> 庞朴：《中国文化十一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133页。

<sup>13</sup> 郑玄注，孔颖达等正义：《礼记正义》卷52，《中庸第三十一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25页。

“中庸”是一种境界,要长期做到“中”并不容易,所以孔子强调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,民鲜久矣。”<sup>1</sup>《中庸》说:“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又说:“诚则明矣,明则诚矣。”<sup>2</sup>认为要做到“中庸”贵在心“诚”,“故至诚如神”。在这里,“中庸”之道强调的是修身,孔子儒家一贯主张“修己以安人”,<sup>3</sup>通过“修己”,人有了个体素养的提升,有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认,才有可能理解“中道”。从实质上讲,孔子儒家的“中庸之道”是修身之道,是君子之道,更是为政之达道。在孔子看来,“以德教民,而以礼齐之”<sup>4</sup>是为政治民的最佳途径,如前所说,“中”来自礼,“以礼制中”,“中道”观念建立在“礼”的牢固基础上,具有相对的稳定性。儒家主张“以和为贵”,同时强调“以礼节和”,认为不可在追求和谐的同时,必须用礼加以节制。礼贵得“中”,知有所“节”则知所“中”。其次是以政治引导人民,但是政教并不意味着排斥刑罚。对于“伤义败俗”而又屡教不改的人,就要使用刑罚,即“以刑教中”。就是从“刑”即型塑的特殊角度,告诉人们什么是“中”,什么样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。所以,孔子的“中道”思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,同时又合乎社会伦常的完整的社会管理之道。

《中庸》说:“君子而时中。”<sup>5</sup>“中”有时也是“变”,因时而权变,与时俱进。“中”是动态的,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无论“以礼制中”还是“以刑教中”都着眼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,使其和谐有序。在孔子看来,社会和谐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,这个规则就是“中道”。这样看来,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下,他作《春秋》,就是要用史学的方式来诠释什么是“中道”,《公羊传》说:“拨乱世,反诸正,莫近诸《春秋》。”<sup>6</sup>极是。孔子之《春秋》为中国史学树立了正气,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明的价值取向。

## (二)“中道”与传统史学

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以私人身份著史的第一人。孔子晚年整理古籍,删《诗》《书》,订《礼》《乐》,“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”。<sup>7</sup>孔子正是看到了其时“世道衰微,邪说暴行有作,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”<sup>8</sup>的状况,心忧天下而作《春秋》,以“道名分”,<sup>9</sup>以“辨是非”,<sup>10</sup>

以“惩恶而劝善”,<sup>11</sup>达到了以历史弘扬“中道”的至高境界。

孔子继承了史学传统中的求真精神。孔子据鲁史而作《春秋》,既注重考据又能阙疑。《春秋》之中,一字之微,必有根据,疑则阙之,“信以传信,疑以传疑”。孔子“多闻阙疑,慎言其余”,<sup>12</sup>坚持“无微不信”,<sup>13</sup>“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”。<sup>14</sup>对于史书记载之不足,孔子根据所见,小心求证给予补充,对于多种传闻必定互参以求实,“信则书之,疑则阙之”。<sup>15</sup>所有这些,对后世史家治史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,创立了编年史体例,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,以月系时,以时系年,将历史事件具体到某一天,弥补了过去“过分注重记言”<sup>16</sup>的不足。《春秋》纪事与上古史家“未尝离事而言理”的治史传统一脉相承,不尚“空言”,主张“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”。<sup>17</sup>《春秋》涉及各国之事,而以鲁国为主。自隐公迄于哀公十四年,

<sup>1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6,《雍也第六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479页。

<sup>2</sup> 郑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礼记正义》卷53,《中庸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632页。

<sup>3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14,《宪问第十四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514页。

<sup>4</sup> 杨朝明、宋立林主编:《孔子家语通解》卷7,《刑政第三十一》,第355页。

<sup>5</sup> 郑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礼记正义》卷52,《中庸第三十一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625页。

<sup>6</sup> 何休注,徐彦疏: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28,哀公十四年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354页。

<sup>7</sup> 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卷2,《内篇二·浙东学术》,第524页。

<sup>8</sup> 曾振宇:《孟子诠释》卷6,《滕文公下》,济南:山东友谊出版社,2012年,第166页。

<sup>9</sup> 郭庆藩:《庄子集释》,《杂篇·天下第三十三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1年,第1067页。

<sup>10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30,《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第3297页。

<sup>11</sup> 杜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27,成公十四年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913页。

<sup>12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2,《为政第二》,第2462页。

<sup>13</sup> 郑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礼记正义》卷53,《中庸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634页。

<sup>14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13,《子路第十三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2506页。

<sup>15</sup> 顾炎武撰,黄汝成集释:《日知录集释》卷4,《所见异词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276页。

<sup>16</sup> 杜维运先生指出《尚书》与《逸周书》等早期文献的缺陷之一是“没有记载明确的时间。杜维运:《中国史学史》(第1册),第72页。

<sup>17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30,《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第3297页。

共记242年史事,“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”。<sup>1</sup>《春秋》以事实为依据,孔子分析其成败得失,又加以功过贬褒。孟子评《春秋》: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,其文则史。孔子曰: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’。”<sup>2</sup>《谷梁传》称:“《春秋》贵义而不贵惠,信道而不信邪。”<sup>3</sup>这里所说的“道”,就是“中道”。孔子治史,其意在弘“道”。

在《春秋》之中,孔子的确在畅畅快快地“以礼制中”。正是因为如此,《史记》说:“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辩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王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”。<sup>4</sup>孔子又说:“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敢辞。”<sup>5</sup>这与孔子“君君、臣臣,父父、子子”<sup>6</sup>的政治主张完全契合。孔子儒家的终极理想是使社会合“礼”,而达到礼制的途径就是“中道”。司马迁称《春秋》为“礼义之大宗”,所以他说: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?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?”<sup>7</sup>

孔子发展了他以前历史记载的贬褒书法。关于《春秋》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谓“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”,“约其文辞而指博”,<sup>8</sup>都是说的孔子陈义“中道”于《春秋》,他蕴含褒贬于其中的“笔削书法”,已经达到了中国史学的“最高境界”。<sup>9</sup>《孔子家语·问玉》和《礼记·经解》都记载了孔子说的: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”,<sup>10</sup>又称:“属辞比事而不乱,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<sup>11</sup>“属辞”指遣词用字,“比事”是排比史事。《春秋》之贬褒书法,简明而达义。<sup>12</sup>比如记战争,讨罪称“伐”,掠境称“侵”,两军相接称“战”,环城称“围”,造其国都称“入”,毁人社稷称“灭”。又如:同为记杀人,有无罪见杀称“杀”,有罪当杀称“诛”,以下杀上称“弑”等不同书法,“《春秋》之义,昭乎笔削”。<sup>13</sup>孔子精湛的“笔削”书法,以贬褒阐明《春秋》大义,所谓“《春秋》之称,微而显,婉而辩,上之人能使昭明,善人劝焉,淫人惧焉,是以君子贵之。”<sup>14</sup>孔子治史论政评理,其深义即在以史育人,蓄德立说。

儒家思想一贯主张“士志于道”,<sup>15</sup>正如人们

所知道的,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“道”,其“人间性”是非常明显的,其突出特点就是“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”。古人强调“人道尚中”。<sup>16</sup>所谓“尚中”,就是指“人间秩序的安排”要符合“中道”,顺应自然,合乎礼,顺乎情。中国史学传统看重义理,历代精通史学的人们都首先以立德为根本,治史爱憎分明,“隐恶而扬善”,主张在长期潜移默化中自觉地塑成正气,化民成俗,为中华民族追求“真”、“善”、“美”<sup>17</sup>的文化品格埋下了根基。

[作者杨朝明(1962年—),孔子研究院研究员,山东,曲阜,273100;王纪东(1977年—),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,山东,曲阜,273165]

[收稿日期:2014年1月18日]

(责任编辑:谢乃和)

<sup>1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30,《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第3297页。

<sup>2</sup> 曾振宇:《孟子诠释》卷8,《离娄下》,第201页。

<sup>3</sup> 范宁注,杨士勋疏:《春秋谷梁传注疏》卷1,隐公元年春正月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2365页。

<sup>4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30,《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第3297页。

<sup>5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30,《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第3298页。

<sup>6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12,《颜渊第十二》,第2503—2504页。

<sup>7</sup> 曾振宇:《孟子诠释》卷6,《滕文公下》,第166页。

<sup>8</sup> 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130,《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,第3297页;《史记》卷47,《孔子世家第十七》,第1943页。

<sup>9</sup> 杜维运:《中国史学史》(第1册),第80页。

<sup>10</sup> 杨朝明、宋立林主编:《孔子家语通解》卷8,《问玉第三十六》,第411页。

<sup>11</sup> 郑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礼记正义》卷50,《经解第二十六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1609页。

<sup>12</sup>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:“孔子在位听讼,文辞有可与人共者,弗独有也。至于为《春秋》,笔则笔,削则削,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”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47,《孔子世家第十七》,第1944页。

<sup>13</sup> 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,第470页。

<sup>14</sup> 杜预注,孔颖达等正义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53,昭公三十一年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,第2126—2127页。

<sup>15</sup> 何晏等注,邢昺疏:《论语注疏》卷4,《里仁第四》,第2471页。

<sup>16</sup> 黄怀信、张懋荣、田旭东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卷3,《武顺解》,第326页。

<sup>17</sup> 庞朴先生认为,“中庸”的“中”,其价值意义可以分为“真”、“善”、“美”三层意思。